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大情报观下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构建思路刍议

吴剑泽 朱庆华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 [目的/意义]《南京共识》规定下的“大情报观”暂时性地终结了已有的情报观争论,为情报学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情报学学科内部的异质性仍有讨论的空间。[方法/过程]本文在对情报学学科内部异质性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描述了大情报观下广义情报学研究的研究体系,进而从过程观与历史性两个维度刻画了广义情报学研究的实用方法体系。[结果/结论]最后提出了“求新声于异邦”的实践进路,并据此尝试性地区分了统计学传统与阐释学传统这两种源于西方的方法论传统。

关键词: 大情报观; 情报学; 研究方法; 方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 G35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System Under the Big Information View

WU Jianze ZHU Qinghua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he Big Information View under the “Nanjing Consensus” temporarily ended the existing debate on the view of informa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l heterogene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s/Proces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internal heterogene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search system of general information science under the Big Information View, and then depicts the practical method system of general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and historicity. [Results /Conclusion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seeking innovatio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tri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of statistics and hermeneutics, which derive from the western methodological convention.

Keywords: Big Information View;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method system

作者简介 吴剑泽(1997-),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情报学理论与方法, E-mail: wjz@smail.nju.edu.cn; 朱庆华(1963-), 博士生导师, 教授, 研究方向为社会化媒体、用户信息行为、健康信息学、情报学理论与方法。

引言

不论是从相关组织机构的建立与更名历程考察情报学的史前史^[1],还是借用库恩(T.S.Kuhn)的“范式”理论对情报学诞生以来的各种研究进行系统归类^[2-6],情报学俨然成为了一个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存在合法性和问题意识的独立学科。与此同时,国内情报学界尽管从未停止对“情报”及其相关概念(如“信息”“知识”“智能”等)在本体论层面的理论探讨^[7-9],但近年来重新从情报观这一认识论视角入手所展开的讨论使得不同学者对于“情报”及“情报学”的理解差异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在“大情报观”下达成和解^[10-12]。就情报学学科而言,《南京共识》规定下的“大情报观”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情报学学科应加强情报学的内部融合以及对于其它学科的外部影响;二是情报学学科应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11]。显然,这对于新时期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既需要在情报学学科内部予以考察,又需要采取一定的外部视角予以审视。尽管关于情报学方法体系以及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讨论已然存在^[13-20],但由于情报学内部固有的异质性尚未探明,在大情报观得到广泛认可的背景下,立足于对情报学内部差异的深入辨析,重新讨论如何构建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或许会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1 情报学学科的本土性

严格来说,当下国内情报学界所称的“情

报学”是一门仅存在于国内的学科,而在“大情报观”的视角下这种学科的本土性则显得愈发明显。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下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在国际学术环境下找不到对应物。事实上,很多在机构上隶属于情报学教育部门或情报学研究部门的学者都可以与国际上从事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Computer Science 等领域^①之研究的学者展开对等的交流。然而,《南京共识》关于当下情报学的学科定位赋予了作为整体的情报学以合法性。因此,这里所讨论的情报学不是科技情报学、社科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安全情报学等的简单加总,也并非 information science、intelligence studies、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的中文翻译,而是“大情报观”下作为整体的情报学。对于此作为整体的情报学,必须首先看到其在我国历史上的多重建构性才能认识到其本土性^[21]。关于情报学在我国从科技情报工作到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再到包括军事情报学在内的情报学教育,以及本世纪信息科学的介入这一发展历程已为学界共识^[11]。之所以强调其历史建构性,则是因为这一发展历程并不像线性的历史陈述那样自然而然,而是在国内诸多学者间的辩驳与争论^[6,22]下达成的和解,因而本土性必然内嵌于其中。也因此,本文在讨论情报学相关问题的时候以国内学者的研究为主,而不再通过跨语言间的映射关系纳入国外学者对其所认为的 information science 等学科的学科定位的讨论。

①此分类依据 Web of Science 对研究领域的划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本土化的、作为整体的情报学其内部的异质性尚未被充分探明,“军口”与“民口”的外在区分^[11,21]似不足以完全澄清这种内在的异质性。尽管得到广泛认可的大情报观为情报学学科指明了发展方向,使学界对情报学学科内部的“同”达成了共识,但是只有对情报学学科内部客观存在的“异”进行充分的认识,才有可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真正实现面向未来的内部融合。

2 情报学学科内部的异质性

本土化的、作为整体的情报学学科的内部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的差异;(2)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的差异;(3)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差异。

2.1 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的差异

情报学学科内部范式的差异经过长期探讨已基本形成共识:源于 intelligence studies 的情报范式与源于 information science 的信息范式^[5,6,21]。前者强调决策支持,后者则更关注信息服务。尽管决策支持必然依赖于特定的信息服务,然而信息服务却未必需要直接地支持决策。若要追根溯源,这一重心的分离实际上发轫于我国早期的科技情报工作。在我国受到其他国家科技封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信息服务(当时还停留在文献服务阶段)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对于国家的决策支持^[6,21];然而当这一历史阶段过去以后,信息范式的研究与工作和情报范式的研究与工作便逐渐分归二途。正是这种范式上的差异使得信息范式的研究与工作常常

遭致情报范式的学者对其缺乏“耳目、尖兵、参谋”之功能的指责^[10]。

那么,在大情报观下情报学所达成的和解是如何解决这种范式差异的呢?就《南京共识》而言,情报范式的研究诉求与工作诉求基本主导了情报学学科的话语权。尽管可以认为这是对以往情报范式研究与信息范式研究间不平衡现象^[6]的反拨,然而如何具体嫁接源于情报范式的决策支持需求和信息范式的研究实际与工作实际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在这进一步的讨论中,首要的则是区分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的差异。

2.2 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的差异

在情报学学科内部,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的关系仍未达成共识^[23]。这一共识尚未达成不是由于不同学者在观点上存在差异,而是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极为有限。在这极为有限的讨论中,“情报学研究为情报工作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的论述占据主流^[23-25],而情报学也被规定为一门应用性学科^[23,25]。从讨论中还可以看出,这种论述与规定是与前述之情报范式紧密相关的,而开展信息范式之研究的学者则很少参与情报学研究 with 情报工作之关系的讨论。

与此同时,已有学者指出,当下我国情报工作缺少科学系统的研究与定位^[26]。实际上,在大情报观下对于情报工作的重新定位是至为关键的。一方面,开展信息范式研究的学者在其研究语境中或许并不存在“情报工作”的概念,而更多指向“信息工作”,尽管这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6],这类学者仍需在其研究语境

中重新“发现”情报工作；另一方面，开展情报范式研究的学者则既需要帮助开展信息范式研究的学者发现其研究语境中的情报工作，又要积极地在“大情报观”下对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工作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其中首要的就是“大情报观”下情报学研究的应用性问题。在以往情报范式的论证中，情报学研究的应用性来源于情报工作的应用性，情报工作是直接地为国家、政府、情报机构服务的；而在“大情报观”下，情报学研究的应用性则必须与情报工作的应用性进行细致的区分，并且不同范式情报工作的应用性之间是否是同质的也需要通过具体实例来予以说明。只有对“大情报观”下的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工作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是应用性的这一点展开深入讨论，而不再以“应用性”一词进行简单的概括，才能深入对学科内部差异的认识，进而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展开有效地对话，从而避免产生自说自话的现象。

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缺少关于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工作之关系的更为广泛的讨论，若仅根据已有学者对此二者之关系的论述，则会发现很多名义上的情报学研究实际上介于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工作之间，可视之为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考虑到这一点，并且结合前述之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工作的区分目前只在情报范式中存在的现状，本文对以往情报学学科内部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和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进行了区分。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即从具体的现实需求出发，应用某种方法或技术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进行识别、跟踪、

比较、评价、预测；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则是在此基础上加入对具体决策过程的建议，服务于特定的决策者；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则可以被定义为从情报工作及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的需求出发，发明、引入、改进某种方法或技术以更好地支持情报工作的研究。

对于情报范式下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和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的区分可以举例说明。如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趋势分析^[27]使用了已经被发明并引入专利分析方法中的专利地图技术，可以算作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又如情报学研究热点识别^[28,29]使用了基于文献外部特征的文献计量方法以及基于文献内容特征的聚类方法，这些方法也是在研究热点识别这一情报工作中业已成熟的方法，故也只能算作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而如对于多维多源创新资源集成平台应用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30]则可以算作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因为这一研究可以支持对特定对象进行评价类的情报工作及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并且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并非已经存在的指标体系；再如构建 SIR-EGM 模型用于网络舆情跟踪与预测的研究^[31]，尽管已有学者将 SIR 模型用于网络舆情研究，但结合了 EGM 模型的 SIR 模型仍然可以视为一种技术上的改进，故可以算作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

2.3 理论研究 with 实证研究的差异

由于情报范式下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在已有文献中仍属于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因此本文暂将此类研究归入广义的情报学研究之中，同时在广义的情报学研究中纳入信息范式

下的情报学研究,以使得广义的情报学研究区别于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狭义)^[23-25]。由此,本文可以从对情报学学科内部异质性的考察深入到对广义情报学研究(暂不考虑与之相对的情报工作)内部异质性的考察之中。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广义的情报学研究呢?本文认为,应当从情报学学科在我国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入手加以考察。当下我国学术体系是我国现代性学术体系的一个发展阶段。从知识系统所包含的内容来看,我国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至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从甲午战前新式学堂的设立以及对西书的译介,到甲午战后分科观念的普及以及“格致学”的移植和“法政诸学”的初建都为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必要的知识基础^[32]。建国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发展对苏联模式的非辩证态度使得即使在1978年学科重建后仍然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之发展存在一定的距离^[33]。然而近年来我国学术体系不断调整,主要表现在本科专业目录的更新换代^[34]以及更多新兴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涌现^[3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结合大情报观的视角和以往学者对情报学作为“社会科学”^[36]、“交叉学科”^[23]的学科定位,本文将积极地吸纳社会科学领域其它学科相关的论述作为补充。

在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study)与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区分^[37,38],其主要区别则在于研究结论是否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得出。经验资料,可以是问卷、访谈所得的文本、实验结果、客观数据等,而文献回顾或专家意见则不在经验资料的范畴之中。借鉴此一分类,本文根据理论、方法、技术^②与经验资料的关系提出广义情报学研究的两种类型:理论研究^③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包括:(1)不依赖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构建理论^③的研究;(2)不依赖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发明、引入、改进方法或技术的研究。经验研究包括:(1)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构建理论的研究;(2)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检验理论的研究;(3)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检验方法或技术有效性、优越性的研究;(4)应用某种理论、方法、技术对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进行某种知识活动(如识别、跟踪、比较、评价、预测)的研究。可以看出,前述之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即此经验研究中的第4种类型,而前述之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狭义)则包括理论研究的第2种类型与经验研究的第3种类型,而这三种研究共同构成了情报范式下的广义情报学研究。

综上,可以得到大情报观下广义情报学研究的研究体系(见图1):

②“方法”与“技术”在不同的学者眼中有不同的含义。在本文中,“技术”指的是在原理上实现方法的具体流程及可能存在的方案选择。以聚类方法为例,该方法指的是将相似的元素尽量聚在一起而将不同的元素尽量区分开,其涉及到的技术包括特征表示方法的确定、相似度度量依据的选择、聚类算法的选择等。

③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往往被认为是一组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命题,并且默顿(R.K. Merton)指出理论具有宏大理论、中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层次之分(参见文献[32-33])。因此本文中的“理论”不仅指代古典信息理论派、社会传播派、智能过程派、属性结构派、决策功能派和系统理论派这些不同学派所持有的宏大理论,而且同样包括基于经验资料所构建或检验的中层理论与微观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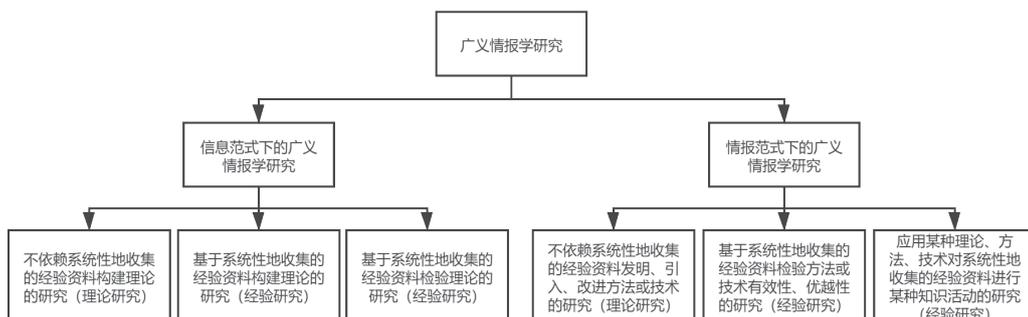


图1 大情报观下广义情报学研究的研究体系

3 过程观与历史性：广义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两个维度

在讨论广义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如何构建之前，或许需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静态的方法体系。这一问题对于一切意欲建立“方法体系”的学者来说都非常棘手，因为他一方面要将已有的方法容纳进去（或者淘汰一部分），另一方面又需要保证此一体系对新方法的开放。这一任务或许可以借用知识组织的先进技术来完成，不过在那之前似乎应当先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体系化的反思中获得一些教益。怀特海（A.N.Whitehead）^[39]所言可资借鉴：“我们必须有体系，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体系保持开放。换言之，我们对它们的局限性应当有所敏感。它在细节方面总会存在有待加以洞察的模糊的‘在此之外’。”尽管怀特海只是声明了体系化的局限性，而未说明我们为何“必须有体系”，但这已足够启发我们将“静态的方法体系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转化为“为何需要方法体系”这一问题了，而这一问题则更容易回答，因为构建一个方法体系

如果不是为了显示研究内部的有序性，那么就是为了指导将来的学术实践。如此一来，本文的目的便不在于构建完备体系，而在于构建实用体系，亦即指导广义情报学研究学术实践的方法体系。

类似的工作已有学者做出了一些尝试^[13-20]，然而多未区分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因而已有的方法体系有待更新。它们的构建思路可以归纳为六种方式：层次说、流程说、功能说、二分说、对象说、时代说^[20]。其中，“功能说”与“流程说”对本文具有参考价值。“功能说”是一种基于方法功能构建情报学方法体系的建构方式^[40]。不过其中存在着研究方法之功能与研究活动之目的错置，如将“预测”看作某类研究方法的功能特点。实际上，与其说“预测”是某类研究方法的功能特点，不如说“预测”是一种研究、工作活动的“目的”；在预测类的研究、工作活动中，可以采取多种研究方法，而这些研究方法却未必都与预测类的研究、工作活动绑定。“流程说”则是一种基于情报实践活动之流程构建情报

学方法体系的建构方式^[14-15]。这一方法体系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情报工作来说是有效的，但不足以涵盖信息范式下的广义情报学研究以及情报范式下的狭义情报学研究。不过其思想值得借鉴，因为各种方法的命名标准并不统一，有的方法规定了从数据收集到结果分析的整个研究流程，而有的方法只涉及数据的收集或者只涉及结果的分析，将这些方法放在一起讨论显然并不合适。因此，构建广义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首先需要采取一种目的论意义下的过程观，亦即在前文所述广义情报学研究体系的基础上，按照研究目的对不同研究活动的类型继续细化，然后对不同目的的研究活动描述其研究过程，进而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讨论可能用到的方法。

然而，若仅止步于此，则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方法体系略显支离。如果再考虑到冠以某一名称的方法本身也可能随时间不断进步，以及某一方法在共时层面上或许还会由于哲学立场的不同而存在学派间的差别，那么情况就又要复杂得多了。因此，有必要将历史维度引入方法体系的构建之中^④。方法体系的历史维度（或历史性），不是指将不同的方法按照历史时期分类，而是指通过阐明每一方法的历时性演进历程来重现方法之间本来就有的内在联系。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当一个方法体系“背负着对其自身来说已成为不可认识的‘过去的’遗物，去寻求摩登的东西”^[44]之时，它便面临着失语

的危险。

4 “求新声于异邦”：构建广义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实践进路

当一个方法体系可以被共时性的过程维度以及历时性的历史维度所刻画时，可以说它暗含了与时俱进的潜能。然而“顶层设计”不能取代“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承认情报学研究的方法大多是外来的（又或者说是社会科学共有的），那么就不能不在具体实践中“求新声于异邦”。这“异邦”是两重的：学科层面以及国别层面。在学科层面，可以积极了解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之比较情报学已经引入的研究方法而学习情报学尚未引入的研究方法。就已经引入的研究方法而言，譬如，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入测量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即在心理学^[45]、管理学^[46]、政治学^[47]、教育学^[48]等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而多元线性回归（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则在经济学^[49]、社会学^[50]中更为常见；就尚未引入的研究方法而言，如基于模型的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model based fMRI）有助于理解行为背后的脑机制^[51]，这一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于情报学研究或有启发。在国别层面，可以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系列丛书或研究方法在线数据库，如“SAGE 研究方法在线数据库”^[52]

④实际上，域外方法论的历史之维常常是其它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参见文献[41-43]），只不过似乎被情报学遗忘了。

⑤自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实证哲学后，“实证主义”发展到今天，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见文献[53]。即使是实证主义及其变种，再加上建构主义，也不足以涵盖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研究方法。参见文献[54]。

包含了 SAGE 出版公司数十年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丛书以及案例集和数据集，这些不断更新的资料可以指导几乎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实践。

在此基础上，如果不满足于常见的缺少历史维度的方法分类，如定量（quantitative）与定性（qualitative）的二分、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二分^⑤，则大致可以辨识出情报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源于西方的两个方法论传统，一为统计学传统，一为阐释学传统^⑥。在统计学传统内部，常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有着很早的统计学源头，而只有在这源头处才可以发见不同的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方法的内在联系。不妨以结构方程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为例。如果不详细考察它们最初所援引的统计学思想，那么大概只能看到路径分析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前身，而不能看到路径系数实际上是一种标准化的回归系数而与多元线性回归有所联系^[55-57]。又如对于测量误差的处理，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同质性信度（homogeneity reliability）控制，而多元线性回归通过基于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控制。已有学者总结了近 50 年来最重要的 8 个统计学思想^⑦，

在这些新兴的统计学思想与经典统计学思想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情报学研究在方法上的联系。

历史维度的引入不仅能够揭示具有不同名称的方法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阐明具有同一名称的方法的内部差异。在阐释学传统内部，情况便颇为复杂，因为不同方法间的哲学立场更为多样。源自 19 世纪狄尔泰（W. Dilthey）的现代阐释学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并不受欢迎，或许唯有格尔茨（C. Geertz）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法得以幸存。格尔茨将民族志研究视为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将其比作文学批评^[59]。他认为，民族志研究不是像科学研究一样要使复杂现象尽量简化，而是要让简单现象尽量复杂化，旨在解释“这一个”文化现象。显然，若按照格尔茨的说法，民族志研究或许并不容于以科学自任的情报学研究了。而本文之所以强调是格尔茨的民族志研究法，是因为民族志研究法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危机与转向^[60]，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民族志研究并不相同。

不过，以上仍是关于方法体系的历史性构建的实践进路的讨论，在那之后，则需要进入

⑥本文将几乎没有运用统计学思想的方法归入阐释学传统之中，如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这一二分尽管考虑到方法演进的历史维度，但仍不能说是完备的。

⑦包括反事实因果推断（Counterfactual causal inference）、Bootstrapping 和基于模拟的推断（Bootstrapping and simulation-based inference）、过参数化模型和正则化（Overparameterized models and regularization）、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s）、通用计算方法（Generic computation algorithms）、适应性决策分析（Adaptive decision analysis）、鲁棒性推断（Robust inference）、探索性数据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参见文献 [58]。

⑧历史研究也只对“这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负责，只探求一种历史性解释。所谓“历史性解释”，即通过描述某一“特定”事件或事物状态如何形成来解释其出现的原因。参见文献 [61]。

⑨暂不考虑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两阶段间可能存在的循环往复情况。此外，关于前文所述之方法体系的历史性的论证或许亦有待补充，因为不仅是资料分析方法在不断演进，研究设计方法和资料收集方法也在不断演进，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过程观这一维度的讨论。前文已述，方法体系的过程观是目的论意义下的过程观，不宜将具有不同研究目的的学术实践等量齐观，而应首先放在广义情报学研究体系下加以辨析。譬如，有的研究旨在解释“特定”现象而不寻求结论的推广，如格尔茨的民族志研究，又如历史研究^⑧；有的研究旨在技术改进，此时并不需要系统性收集的经验资料；有的研究旨在新数据集上检验已有技术的有效性或优越性；有的研究则旨在新情境下检验已有理论的适用性，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如果我们暂时放弃对特定研究“价值究竟几何”（亦即是否果真具有它所宣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追问，那么仍然可以大致按照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三个阶段来划分所有学术实践的全过程^⑨。

如此一来，阐释学传统中的一些方法可以获得必要的区分。譬如，可以首先根据结论是否需要推广区分案例研究、扎根理论与民族志研究、历史研究（前二者需要推广，后二者不需推广），然后根据资料收集方法区分案例研究与扎根理论（前者需要深入当代实际社会情境以获取资料^[62]，后者则往往通过访谈获取资料）。与此同时，统计学传统中的方法演进也可以在资料分析阶段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譬如，不论是显式地用方程表示的模型（如回归方程）还是隐式地用方程表示的模型（如结构方程模型），它们的参数（亦即回归系数或效应量）都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经典的参数估计方法获得，那么这些参数估计方法是否有必要单独列出以纳入方法体系之中也是未可定论的。而在这些传统建模方法之外，还有

基于情境建模的计算实验^[63]、结合贝叶斯统计思想的建模方法^[64]等，如果不从建模思想的历史演变角度来考察这些方法，而将其平行并置于一体系之中，无疑也会大大削弱方法间联系的直观性。

5 结语

本文从“大情报观”下情报学学科的内部异质性入手，讨论了广义情报学研究可能的研究体系，进而从过程观与历史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实用广义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思路以及“求新声于异邦”的实践进路。仍需强调，构建方法体系不应当成为目的而只应看作认识方法间联系与差异的手段，它有助于我们避免哈耶克（F.Hayek）所说的唯科学主义：“对自己的题目不加思考，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65]同时，“求新声于异邦”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学科内部发展的停滞，毕竟即使是最能代表情报学学科的“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在当代也几乎没有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进步^[66]。最后，考虑到一切体系的不完美，或许需要借用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之言——“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67]。

参 考 文 献

- [1] 马费成. 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前沿课题[J]. 图书情报知识, 2013(2):4-12.
- [2] 梁战平. 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3(3):193-198.

- [3] 李赞梅,周鹏,王璇.当代情报学理论思潮:历史主义[J].图书情报知识,2012(1):30-35,42.
- [4] 马费成.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5] 肖勇.新世纪中国情报学发展走向的展望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07(4):5-10.
- [6] 周晓英,陈燕方.中国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冲突与思考[J].公安学研究,2019,2(2):27-44,123.
- [7] 吴晨生,张惠娜,刘如,等.追本溯源:情报3.0时代对情报定义的思考[J].情报学报,2017,36(1):1-4.
- [8] 付宏,杜智涛,刘光宇,等.情报概念的变迁与情报“元问题”的回归[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7):31-36.
- [9] 杨建林.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再认识[J].情报学报,2020,39(3):317-329.
- [10] 苏新宁.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情报学报,2017,36(4):331-337.
- [11]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情报学报,2017,36(11):1209-1210.
- [12] 周京艳,刘如,赵芳,等.新时代大情报观的重塑[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8):9-12,5.
- [13] 王崇德.情报学研究方法概论[J].情报科学,1985(6):1-7.
- [14] 缪其浩,徐刚.论科技情报分析研究工作的方法体系[J].情报理论与实践,1988(2):17-20,6.
- [15] 包昌火.方法论的建设对情报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J].情报理论与实践,1988(2):3-6.
- [16] 余波,温亮明,张妍妍.大数据环境下情报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J].情报科学,2016,34(9):7-12.
- [17] 李博闻,章成志.我国情报学研究方法研究综述[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2):1-6,37.
- [18] 唐明伟,蒋勋,徐臻元,林琳.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方法与技术体系构建[J].情报科学,2020,38(5):106-111.
- [19] 肖连杰,成洁,蒋勋.大数据环境下国内情报分析研究方法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2):40-47.
- [20] 李博闻,章成志.我国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构建研究的转向突破[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6):37-43.
- [21] 李阳,孙建军.中国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本土演进:理论命题与话语建构[J].情报学报,2018,37(6):631-641.
- [22] 包昌火.对我国情报学研究中三个重要问题的反思[J].图书情报知识,2012(2):4-6.
- [23] 杨建林.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再认识[J].现代情报,2020,40(1):4-13,23.
- [24] 陈超.谈谈情报学研究方法与情报工作[J].竞争情报,2017,13(4):3.
- [25] 苏新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展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未来[J].科技情报研究,2019,1(1):1-12.
- [26] 王艳卿.关于我国情报学发展的问题研究[J].图书情报研究,2020,13(1):29-34,39.
- [27] 谢志明,张媛,贺正楚,张蜜.新能源汽车产业专利趋势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5(9):127-141.
- [28] 邱均平,温芳芳.近五年来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基于13种高影响力外文源刊的计量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2):51-60.
- [29] 赵蓉英,余波.近三年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比较分析[J].情报科学,2019,37(4):3-9,170.
- [30] 迟婧茹,武思宏,廖苏亮,任孝平.多维多源创新资源集成平台应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德尔菲法[J].情报工程,2020,6(2):48-56.
- [31] 彭程,祁凯,黎冰雪.基于SIR-EGM模型的复杂网络舆情传播与预警机制研究[J].情报科学,2020,38(3):145-153.
- [32]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知识系统之创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33] 袁曦临.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 教高函〔2020〕2号[EB/OL]. (2020-02-25)[2021-01-2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2003/t20200303_426853.html.
-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EB/OL]. (2020-08-27)[2021-01-29].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22/202008/t20200827_480690.html.
- [36] 叶鹰. 图书情报学中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哲学基础及双重整合原理探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2):4-12.
- [37]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3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38]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2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9] 怀特海. 思维方式[M]. 刘放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7.
- [40] 刘东维. 情报研究方法论纲[J]. 情报学报, 1988, 7(3):186-192.
- [41] 彭玉生. “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2): 180-210, 246.
- [42] 郭台辉. 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8):45-64, 205-206.
- [43] 陈心想. 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J]. 社会学研究, 2019, 34(1): 1-28, 242.
- [4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3版)[M]. 陈嘉映, 王庆杰,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442.
- [45] 徐鑫镔, 邓赐平, 刘明. 父母学业参与和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关系: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父母心理控制的调节作用[J]. 心理科学, 2020, 43(6):1341-1347.
- [46] 符国群, 姜海纳, 张晓丹. 家务时间配置如何影响夫妻对家庭省时产品的购买[J]. 管理世界, 2020, 36(10):126-139.
- [47] 郑建君. 政治知识、社会公平感与选举参与的关系——基于媒体使用的高阶调节效应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9(2):73-87, 127.
- [48] 朱红, 张文杰. 精英大学生家庭特征及其对子女能力素质的影响——以北京大学2016-2018级新生为例[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10):71-82.
- [49] 蔡庆丰, 陈熠辉, 林焜. 信贷资源可得性与企业创新: 激励还是抑制?——基于银行网点数据和金融地理结构的微观证据[J]. 经济研究, 2020, 55(10):124-140.
- [50] 石智雷, 顾嘉欣, 傅强. 社会变迁与健康不平等——对第五次疾病转型的年龄—时期—队列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6):160-185, 245.
- [51] 高青林, 周媛. 计算模型视角下信任形成的心理和神经机制——基于信任博弈中投资者的角度[J]. 心理科学进展, 2021, 29(1):178-189.
- [52] SAGE Publications. SAGE Research Methods[EB/OL]. [2021-01-29]. <https://methods.sagepub.com/>.
- [53] 沃野. 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J]. 学术研究, 1998(7):31-36.
- [54] 曾荣光. 管理研究哲学[M]. 任兵, 袁庆宏,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4.
- [55] Wright S. The method of path coefficients[J].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34, 5(3):161-215.
- [56] Wright S. Correlation and causatio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1921, 20:557-585.
- [57] Everitt B S, Skron dal A.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4th ED)[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321.
- [58] Gelman A, Vehtari A.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tatistical ideas of the past 50 years[Z/OL]. (2021-01-21)[2021-01-29]. <https://arxiv.org/pdf/2012.00174.pdf>.
- [59]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6-17.
- [60] 王海龙. 导读一: 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M].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王海龙, 张

- 家瑄,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16.
- [61] Glennan S. Ephemeral mechanisms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J]. Erkenntnis, 2010(72):251-266.
- [62]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5th ED)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4:16.
- [63] 盛昭瀚, 张维. 管理科学研究中的计算实验方法 [J]. 管理科学学报, 2011, 14(5):1-10.
- [64] Van de SCHOOT R, Depaoli S, King R, et al. Bayesian statistics and modeling[J/OL]. Nat Rev Methods Primers, 2021, 1(1). (2021-01-14)[2021-01-29]. <https://doi.org/10.1038/s43586-020-00001-2>.
- [65]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M]. 冯克利,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6.
- [66] Sooryamoorthy R. Scientometrics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M]. New York: Routledge, 2021:10.
- [67]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M]. 贺绍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104.